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NOMICS

新时代经济问题  
研究丛书

#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理论探索

袁富华 张平 刘霞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NOMICS

新时代经济问题  
研|究|丛|书

#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理论探索

袁富华 张平 刘霞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探索/袁富华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 - 7 - 5203 - 4360 - 2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8483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曦  
责任校对 杨林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定价 6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高培勇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龙登高	朱 玲	朱恒鹏	刘树成	刘霞辉
杨春学	张 平	张晓晶	陈彦斌	赵学军
胡乐明	胡家勇	徐建生	高培勇	常 欣
裴长洪	魏 众			

## 编写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征程、新变化、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中国经济学界迎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时代命题。跟踪研究新时代经济问题，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中国经济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秉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宗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来重视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及建所 90 周年之际，我们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开展了一系列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新时代经济问题研究丛书》编撰工作。这套丛书重点关注以下 4 方面问题：一是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二是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好经济学意义解释；三是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四是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力求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理论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也敬请学界关注我们陆续推出的丛书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三个命题	1
一	引言	1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突破	2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三大命题	6
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措施	12
第二章	长期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转型经济的一个规律	14
一	引言	14
二	数据及数据应用说明	16
三	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主要因素分解	19
四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	26
五	“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之间：结合中国经济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31
六	结论	34
七	附录1 7国人均GDP增长率分解	35
八	附录2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为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之和	40
第三章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数据和国际比较	42
一	引言	42

二	研究方法	与数据	44
三	长期增长中的要素动态及国际经验事实		52
四	长期增长的效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和增长效率问题		63
五	结论		70
第四章	生产率增长：实体与非实体经济均衡问题分析		73
一	发达国家生产率下降的经验事实		75
二	劳动生产率下降背后的实体与非实体部门的均衡理解		80
三	中国的生产率的计算		84
四	实体创新与降低金融风险		90
第五章	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经济演化低效率的原因		92
一	问题的提出		92
二	演化低效率及其成因的一些事实		93
三	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		97
四	中国经济分割及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退化的迹象		101
五	结论		104
第六章	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		106
一	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107
二	人力资本结构变化过程中的跃迁现象与临界现象		112
三	人力资本结构的外部性及因果累积		118
四	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与升级对策		122
第七章	中国经济大转型：传统结构主义终结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组织取向		125
一	引言		125

二	要素、组织与转型的一般分析·····	126
三	中国工业化：传统结构主义的经济组织及其终结·····	132
四	全有抑或全无：创新系统转型与制度组织变革·····	139
五	结论·····	143
<b>第八章</b>	<b>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b>	<b>145</b>
一	引言·····	145
二	增长过程的经济减速与突破·····	147
三	通用技术与知识生产的两部门模型·····	152
四	资源配置制度与新要素供给障碍·····	164
五	制度与政策的体制选择·····	168
<b>第九章</b>	<b>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问题分析·····</b>	<b>171</b>
一	中国工业化税收与城市化公共服务支出关系的 经验事实·····	171
二	基于省级面板的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匹配性计量·····	182
三	增长阶段转换下的财政模式演化的逻辑·····	187
四	面向城市经济的财政体制改革框架和政策选择·····	194
<b>第十章</b>	<b>稳中求进与风险控制：储蓄耗散趋势下的体制完善·····</b>	<b>197</b>
一	引言·····	197
二	转型理论：增长、调整与稳定·····	198
三	结构条件：储蓄与投资：财政、金融制度的不相容性·····	202
四	稳中求进：风险防范和效率增进·····	208
	<b>参考文献·····</b>	<b>211</b>

# 第一章 总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三个命题

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不同于工业化的效率模式。围绕效率改进和增长可持续分析，本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出了一个理论诠释，归纳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第一，结构性减速，即由于结构条件变化而发生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第二，增长非连续与增长分化，即由于内生机制的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城市化阶段的增长停滞和震荡；第三，与服务业和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效率补偿命题，即在服务业和消费主导替代资本驱动的趋势下，效率的提升机制和经济可持续路径。

## 一 引言

发展经验表明，改造传统社会进而把经济引向现代增长的工业化努力，在大多数后发国家通常比较成功。但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而向发达阶段迈进的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往往无法避免增长分化风险，致使陷入城市化阶段的长期调整和增长震荡。这种困难源于转型过程对于发展条件变化的反应滞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正是集中于大转型推动和效率模式的重塑。

中国现阶段正在经历的新常态，源于原有工业化条件和动力的消失，包括边际收益递减下资本驱动基础的削弱、人口结构转变和劳动力拐点的发生、干中学效应的下降，以及经济结构服务化所导致的资本积累方式的再评价，等等。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状态，以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新趋势及其条件变化，要求新的效率模式的建立。

城市化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增长方式。无论是中期内从规模增长向中高端的产业转型，还是长期内可持续性增长路径的达成，都需要摆脱原有外生性和外向性的发展方式。但是，在内生机制的培育方面，需要服务业和消费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以弥补低端制造业退出所留下来的空白。效率补偿机制的关键，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以此实现高等次人力资本积累、发挥知识过程的创新带动和溢出效应。

鉴于中国人口存量的巨大规模和原有低成本工业模式的惯性，全社会意义上的人力资本要素更新，将是一个缓慢过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和创新潜力，形成以大城市为知识生产配置中心、以中小城市为劳动密集型发展为互补的一体化模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突破

各国各个时期重大经济理论的探索、争论和检验，都与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有关。作为发展理论的重要理念和传统，对经济决策能力和经济动员能力的重视（Hirschman, 1978），目的都在于激发经济活力和保持经济可持续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逻辑，我们首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和理念着手，对这个命题给出解释。

###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变化

发展状态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达状态给出的定位。如，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化，日本在80年代初期完成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并实现了核心技术和金融力量的全球扩散；其后，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效率模式，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Lechevalier, 2014）。尽管在具体理念、技术路径和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但是大多数经济追赶国家，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所面临的调整和转型问题是相似的——克服原有粗放增长方式所累积的制度僵化症，塑造适应于城市化新阶段的效率模式（Ozawa, 2007）。这种趋势和要求意味着，发展状态的決定因素或长期增长潜力的促进条件，在转型时

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系统性调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即包含了这样的认识逻辑。我们首先立足于结构变化的特征和事实给出分析：

1. 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FP）改进路径受阻和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旧常态，遵循了传统结构主义的发展观念（袁富华、张平，2017a），这个理念具体化为持续高速增长赖以运转的外向性、外生性和负的外部性，即通常所说的资本驱动增长路径。问题在于，旧常态的运转是建立在有利的劳动力、投资和技术机会之上的，一旦这些支撑条件消失，规模经济效率就会失去基础。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显著持续下降，即是旧常态动力衰竭和新常态发生的征兆。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楠玉等，2017；张平，2017）：第一，1985—2007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工业化的结构性加速时期。2008年以来工业总体劳动生产率出现持续快速下降，考虑到这种趋势是发生在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推进时期，自然的判断是，以往以规模扩张促进效率增进的条件正在消失。第二，1985—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2008—2015年下降为不足20%，即使假定2016—2020年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提高到30%，在现有投资和劳动力变动趋势下，保持6%以上的增速仍然面临挑战。值得关注的是，现阶段的经济转型，由于原有模式的经济机会越来越少，投资脱实向虚将进一步挤压技术进步的提升空间，TFP改进路径受阻成为结构调整的棘手问题。第三，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以及TFP贡献份额提高的困难，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加剧这种矛盾的因素还有资源环境约束、投资消费失衡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冲击等。

2. 新常态下经济因素的变化。从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和制度组织的作用看，中国大规模工业化主要依赖静态比较优势，在承接国际边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是，发展因素的变化正在削弱这种基础。（1）静态比较利益的源泉，首先是所谓人口机会窗口与工业化过程的重叠。这种事实在中国的表现，一方面是过剩劳动力被现代部门逐步吸收的存量调整；另一方面，增量劳动力中依然以

初等、中等文化程度为主，以适应加工制造规模扩张节奏。但是，一些结构问题也因为新常态的发生而凸显，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拐点的出现，预示着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耗竭，而低层次人力资本过度累积，也为城市化的创新潜力挖掘和技术进步带来了障碍（袁富华等，2015）。（2）传统结构主义理论主导下的工业化生产组织，与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相适应，却孕育了新常态下抑制增长质量改进的矛盾。矛盾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工业部门内部演化和效率改进的动力不足，即现阶段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的过渡时期中，受到资本驱动模式惯性的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所需的创新能力供给不足。二是以大众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为目的的工业化过程，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服务业只作为工业过程的一个分工结果被动成长，并且被认为与工业化的初级要素驱动在本质上一样。但是，当经济结构服务化日渐成为增长主导力量的趋势下，服务业低端化将会从根本上阻碍整体经济效率的改善和增长的可持续。（3）制度僵化症。当然，可以把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上述矛盾和问题，归结为原有体制和规则对新变化的不适应。现有文献对工业化的政府干预以及干预的效率影响问题，分析得足够多了，在此我们只想做一个提示，即鉴于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不同于工业化过程的特殊性质，对政府作用重新定位、对市场激励重新确立，以便于提高制度组织弹性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是转型和调整的重中之重。

## （二）转型方向：迈向中高端的三原则

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向城市化的转型，本质上是增长方式的重塑。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服务业一改以往作为工业化从属和分工结果的被动地位，而以效率促进和效率补偿者的身份，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存在。我们认为，这也是权威人士在论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候，着重强调提高发展质量、注重以人为核心的根据所在（龚雯等，2016）。

张平（2017a）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和调整路径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概括，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份额提高和经济可持续”，这与转型和调整对发展质量提高的要求相契合。三

原则的提出有着丰富的经济内涵和鲜明的政策指向，具体可从以下几个层次来理解：（1）迈向中高端的产业演进方向及其特征。前期研究中，我们对传统雁阵理论及其拓展到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的一些命题给出了分析（袁富华、张平，2017b），其中包含中高端环节的说明。首先，根据传统雁阵模型，工业化是一个分阶段、有序推动的过程：在技术可获得以及增长阻碍因素消除的理想情景下，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实现劳动力向储蓄和资本积累的转变，并推动经济进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阶段；这个过程中，经济潜力得到进一步动员，赫希曼意义上的投资能力进一步提升，以此推动增长步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阶段。如果仅仅从工业部门的这种结构演进路径来看，中国迈向中高端的一个重要调整方向，是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主导。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主导、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主导，现阶段正处于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主导的过渡时期。（2）劳动生产率改进的实现路径。产业的雁阵演进沿着“筱原基准”——收入弹性基准与劳动生产率上升率——调整和优化，不仅表现于工业部门内部而且表现于服务业部门内部的优化升级，在向中高端的迈进的转型时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效率补偿作用甚至是极为关键的决定因素。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对效率提升的内在逻辑给出一个简单提示：根据增长核算方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资本深化和 TFP 变动的加权和。从大规模工业化的一般经验——资本积累的快速提高来看，至少在重工业化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大多得益于资本深化的推动，即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作用赋予了较大权重。特别是中国 1985—2007 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权重甚至在 70% 以上。资本驱动的规模效率，挤压了由于中学所提供的 TFP 增长贡献，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 20%。但是，单纯依赖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路径，最终会遇到资本收益递减和市场饱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刚性约束，这些都是转变增长方式、提高 TFP 贡献的内在原因和动力，或者成为迈向中高端目标确立的根据。（3）虽然一般认为从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就是一切，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保持这个变量的持续增长却要涉及结构性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主导增长的城市化阶段，服务业在替代制造

业份额的过程能否提供充分的效率补偿，是本质上决定可持续的因素，这一点留待下文详细分析。

三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发展质量提高，但是最终需要通过人的发展来实现。如果说中国工业化是以生产供给和技术模仿等物质要素为重心，那么城市化的重心是人力资本，是建立在基本物质品需求普遍满足之上的新的经济进步。对于迈向中高端和可持续潜力挖掘的转型和过渡时期，“筱原基准”隐含的一个关键要求是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提高——既与效率提升直接关联，又与行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有关。同时，这种诱致机制也对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能力提高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换句话说，与科教文卫体等直接关联的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的上升，不仅是服务业主导地位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体现消费的效率补偿功能的重要途径。

###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三大命题

本部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给出分析。根据国际比较和经济系统自身的演化规律，我们从结构性减速、增长非连续和增长分化以及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效率补偿这三大基本命题出发，顺次揭示经济追赶过程的一些重要机制和趋势。

#### （一）结构性减速命题的效率内涵及其重要性

结构性减速命题的提出，最初是基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而导致经济减速的普遍经验的观察（袁富华，201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问题课题组，2012）。尽管对这一认识角度存在较多的争论，且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尚多（金刚、沈坤荣，2017），但在理解发展（而非发达）状态变化的特殊性方面，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出发点。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仍然处于发展状态的追赶经济体而言，要素和经济组织的结构条件变化之于效率和可持续的潜在巨大冲击，需要认真对待。

1. 诱致机制、雁阵模型和工业化潜力的开发逻辑。小岛清的国际分工互补理论及其与雁阵模型的融合（袁富华、张平，2017），加上赫

希曼对发展过程中诱致机制的阐释，已经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追赶的工业化逻辑。实际上，这三种理论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即，按照赫希曼所谓发展任务重在培育和释放储蓄和投资能力的观点，后发国家以其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发达国家边际产业转型，以此实现特定阶段与国际分工的互补和国内主导产业的确立，对于工业化前后向关联网络的建立，无疑是可行的和有利的。而且，随着干中学能力的提高，投资能力的提升无疑会强化诱致机制的效果，在顺次克服工业发展瓶颈的同时，实现规模化扩张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中国的工业化实践与这种理念吻合得非常好。

2. 要素结构变动导致的经济减速。作为效率改进的重要基础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以独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与工业化先行国家和地区的分工互补。联系前文有关劳动生产率与TFP的关系的分析，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导致减速的冲击如下：第一，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工业化进程，首先得益于劳动力存量的规模优势——非熟练劳动力的使用即传统结构主义和发展理论所谓潜在储蓄和人口红利的动员。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出现，标志着初级劳动力要素供给的倒U形趋势出现，根据增长的普遍经验，这种人口的结构变化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和大规模资源动员能力的结束，规模化效率的基础逐步失去。第二，资本积累变化的影响。投资的诱致机制，即投资产生更多投资（Hirschman, 1978）的积累状况，在工业化时期尤其显著。换句话说，在满足技术可获性、适用性和国际分工互补的比较优势条件下，工业化是实现资本快速积累和规模效率的最佳途径。这个过程中，资本深化是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动力。但是，基于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最终也会受到自身结构条件的根本制约，突出表现就是粗放的资本投入导致收益递减，进而阻碍积累扩张。第三，干中学。资本诱致机制的持续作用或者投资能力的扩张，得益于干中学效应。增长核算分析中通常将其作为残差处理，但若虑及认知能力和知识结构对于新经济活动开拓的重要性，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低估了干中学的作用。从纯粹数量分析的角度看，干中学的重要性也被特定增长阶段的资本驱动的作用掩盖了，特别是中国2008年以来投资的高企更是抑制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

3. 工业结构变动下的经济减速。产业结构变动与要素结构变动所引致的经济减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诱致机制和雁阵模式在产业结构上有着更加具体的表现。总体来说，投资诱致机制首先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资源再配置，借此实现规模效率的提升和结构性加速；在此基础上，现代部门内部发生工业化向经济结构服务化的递进，其间，由于规模和数量型扩张基础的削弱甚至丧失，结构性减速发生。联系国际分工互补下产业的发展趋势，问题会看得更清楚：起初是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推动增长，随着来自“干中学”的生产和管理能力的提高，投资诱致导致中间部门产生、发展，进而为高收入弹性的最终品生产提供机会。完整的工业雁阵升级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主导→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主导→零部件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知识信息主导。典型如中国，现阶段正处于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的过渡时期，以质量换速度的产业升级条件已经具备。

## （二）增长非连续命题与全有全无法则

一些研究对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及其后的增长非连续问题进行了探索（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6）。经济发展的追赶经验表明，大多数国家由于在城市化时期不能提供足够的效率维持动力，陷入了长期调整和震荡，阻碍经济潜力和投资能力的结构性因素也因此被一步步固化了。增长非连续即由于诱致机制的受阻所产生的路径分化——典型如拉美国家，租金抽取模式取代了可持续的经济结构服务化路径。要么重塑效率模式要么停滞的“全有全无法则”左右了经济。

1. 服务业主导的产业雁阵的一种不利状况——城市化对要素投入的再评价。联系前文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的分析，资本驱动工业化的规模效率持续快速提升，得益于增长对资本所赋予的较大权重——0.7 以上的资本产出弹性，相应地，劳动产出弹性约为 0.3。根据城市化的普遍经验，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增长路径将发生弹性参数逆转，即赋予劳动所得较大权重、资本权重相对降低。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在要素作用的这个再评价环节上出问题。我们首先对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结果的一个侧面给出说明：对于这个侧面的假设是，随着产业雁

阵的演进，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份额且日益主导经济增长，如果这种替代仅仅是比重的替代而没有效率的补偿和提供，效率改进无法覆盖成本的后果，即鲍莫尔成本病。具体而言：第一，随着资本驱动的低成本工业化向高价城市化的转换，生产成本——包括租金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削弱了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基础，这是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现象。也正是由于这种客观趋势的作用，大规模投资的动力消失。但是，资本驱动的效率改进模式终结的同时，工业部门内部如果没有内生机制的建立，将无法达成向技术知识密集阶段的升级优化。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就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言，受到低素质劳动力状况改善滞后的影响，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人口漂移，即城市人口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简单替代。由低素质劳动力推动的服务业的扩张及其对制造业份额的替代，依然不能建立服务业的内生机制，更谈不上服务业发展对工业的带动了。

2. 增长非连续与不可持续。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内生机制的缺失，可以直接导致“筱原基准”和诱致机制失灵、有效投资活动受限以及投资/消费进一步失衡，迫使经济增长退化为租金抽取模式。如，布尔默—托马斯（2000）认为，拉美国家工业化之后的长期调整和经济震荡，源于垄断和寻租对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阻碍，租金抽取模式抑制了该地区投资扩张和经济的可持续。实际上，由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发展阶段向发达阶段演进的中断，往往被两种不利因素加剧：一是资本驱动所导致的失衡，尤其是在大规模工业化基础逐渐失去的转型时期，这种过度投资带来的往往不是效率改进，而是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二是过度消费所导致的长期生产性投资的不足，这一点在传统发展理论中受到较多关注，且在拉美国家的长期增长和调整中表现得较为典型。资本驱动和拉美式低层次消费主导，之于效率的长期改善均无裨益，深层次的机理是：“筱原基准”与产业雁阵的关联受到损害。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工业自身的发展演替，到资本密集型阶段就戛然而止，继而直接奔向被人口漂移覆盖的经济结构服务化，那么由于效率内生改进条件的丧失，人均收入增长及相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停滞，高收入弹性的产业发展引致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经济被压制在中低收入的震荡水平上。